

哲学家死亡录

[英]西蒙·克里切利 著

王志超 黄超 译

商务印书馆

如果让我写一本书，我将会做一个记录各式死亡的登记簿，再加上我的评论。教会人们死亡的人也将教会他们活着。

——蒙田，“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目 录

序言

学习怎么死——苏格拉底 007

笑着去死 012

关于已故哲学家的书 021

190 余位已故哲学家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自然哲学家、贤人与智者 003

泰勒斯	梭伦	奇伦
佩里安德	埃庇米尼得斯	阿那克西曼德
毕达哥拉斯	狄麦卡	赫拉克利特
埃斯库罗斯	阿那克萨戈拉	巴门尼德
爱利亚的芝诺	恩培多克勒	阿凯劳斯
普罗泰戈拉	德谟克利特	普罗迪克斯

柏拉图主义者、昔勒尼派、亚里士多德派与犬儒派 023

柏拉图	斯彪西波	色诺克拉底
阿凯西劳斯	卡尼亚德斯	赫格西亚斯

亚里士多德	泰奥弗拉斯托斯	斯特拉波
吕科	德米特里厄斯	安提斯泰尼
第欧根尼	底比斯的克拉底	希帕基亚
梅错克	梅尼普斯	

怀疑主义学派、斯多噶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 038

阿那克萨库斯	皮浪	基提翁的芝诺
阿里斯顿	狄奥尼修斯	克里安提斯
克利西波斯	伊壁鸠鲁	卢克莱修

古代中国哲学家 051

孔子	老子	墨子	孟子
庄子	韩非子	禅宗与死亡艺术	

罗马人(严肃的与不严肃的)与新柏拉图主义者 062

西塞罗	塞内卡	佩特罗尼乌斯
爱比克泰德	劳迪西亚的波勒摩	柏里格里诺斯·普洛透斯
马可·奥勒留	普罗提诺	希帕提亚

基督教圣徒们的死 076

圣保罗	奥利金	圣安东尼
尼撒的圣格列高利	圣奥古斯丁	波爱修斯

中世纪哲学家: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 090

可敬的比德	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
阿尔-法拉比	阿维森纳或伊本·西纳
圣安瑟伦	所罗门·伊本·加比洛尔
阿贝拉尔	阿威罗伊或伊本·拉什迪
摩西·迈蒙尼德	沙哈布·阿尔-丁·苏哈拉瓦迪

中世纪晚期的哲学 104

大阿尔伯特	圣托马斯·阿奎那
圣波那文图拉	拉蒙·卢尔
布拉班特的西格尔	圣约翰·邓斯·司各脱
奥卡姆的威廉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 112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马基雅维利	伊拉斯谟	圣托马斯·莫尔
马丁·路德	哥白尼	第谷·布拉赫
彼得吕斯·拉米斯	蒙田	乔达诺·布鲁诺
伽利略	弗朗西斯·培根	康帕内拉

理性主义者(唯物论与非唯物论)、经验论者以及宗教异见者 130

格劳秀斯	霍布斯	笛卡儿
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		伽森狄
拉罗什富科	帕斯卡尔	格林克斯
安妮·康韦	洛克	达玛瑞斯·卡德沃斯
斯宾诺莎	马勒伯朗士	莱布尼茨
维柯	安东尼·阿什利·柯柏	
约翰·托兰	贝克莱	

启蒙哲学家、唯物主义者与感伤主义者 158

孟德斯鸠	伏尔泰	拉迪卡蒂·迪·帕塞拉诺
沙特莱侯爵夫人	拉美特利	休谟
卢梭	狄德罗	

德意志哲学家群体与一些非德意志哲学家 174

温克尔曼	康德	伯克	渥斯顿克拉福特
孔多塞	边沁	歌德	席勒

费希特	黑格尔	荷尔德林	谢林
诺瓦利斯	克莱斯特	叔本华	海涅
费尔巴哈	施蒂纳		

怀疑论学者和一些不怀疑的美国人 197

爱默生	梭罗	密尔	达尔文
克尔凯郭尔	马克思	威廉·詹姆斯	尼采
弗洛伊德	柏格森	杜威	

漫长的 20 世纪 I: 战争时期的哲学 212

胡塞尔	桑塔亚那	克罗齐	秦梯利
葛兰西	罗素	施利克	卢卡奇
罗森茨维格	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	卡尔纳普
埃迪斯·施泰因	本雅明		

漫长的 20 世纪 II: 分析哲学家、欧陆哲学家、数名濒临死亡和一位有过临死体验的哲学家 231

伽达默尔	拉康	阿多诺	列维纳斯
萨特	波伏瓦	阿伦特	梅洛-庞蒂
奎因	西蒙娜·韦伊	艾耶尔	加缪
利科	巴特	戴维森	阿尔都塞
罗尔斯	利奥塔	法农	德勒兹
福柯	鲍德里亚	德里达	德波
多米尼克·贾尼科		西蒙·克里切利	

最后的话 271

地理信息与致谢 274

参考文献 277

译后记 292

序言

本书始于一个简单的命题：人类生存于地球一隅，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的不仅是对死亡本身的害怕，也包括肉身湮灭带来的无边恐怖。这种恐怖既有对死亡之不可避免及其带来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之痛苦的展望，也包括对坟墓以及身体被钉在一个盒子^[1]里，埋到地下，然后成为蛆虫食物的恐惧。

然而，一方面，我们被诱导着否认死亡的事实本身，并义无反顾地奔向健忘、愚蠢地陶醉于占有金钱财物所带来的肤浅享受；另一方面，肉身湮灭的恐怖又使我们盲目地相信某些古代信仰和很多新式说教，它们都能提供意在拯救的巫术以及永生的许诺。我们似乎既寻求着瞬间遗忘的短暂慰藉，也寻找着来生的神奇救赎。

喝醉之后，我们容易逃避现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哲学式的死亡理想却有着令人清醒的力量。正如西塞罗所说：“探讨哲

[1] 盒子，指棺材。——译者注（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学便是学习怎么死。”对古代大部分哲学家来说，这种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它在现代哲学家中也不乏响应者。依此类观点，哲学思考就是为我们的死亡做准备，为死亡提供训练，并培养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即在不为来生提供许诺的前提下去直面肉身湮灭的恐怖。蒙田曾提到过埃及人的风俗：在奢华的宴会中，他们会带来一种象征着死亡的道具——通常是一具骷髅；它被带到宴会厅中，还有个人专门对他们喊话：“喝酒吧，行乐吧，因为你们死后，就跟这具骷髅一样。”蒙田从他的埃及趣闻中引申出了这样的寓意：“这样，我便养成了不仅在头脑中，而且在嘴巴里也频繁描述死亡的习惯。”

哲学式的死亡就是把死亡放在你的嘴里、你讲的话里、你吃的饭里、你喝的酒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开始直面肉体湮灭的恐怖，因为最后是对死亡的恐惧征服了我们，并使我们既喜欢暂时的遗忘，又向往不朽的永恒。正如蒙田所写：“学会了怎么死的人们就会忘记如何做奴隶。”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预先思考死亡等于提前谋划自由。因此，逃避死亡就是自甘束缚，就是甘愿沉沦。否认死亡就是憎恨自我。

在古代，哲学提供面对死亡所必需的智慧是一种惯常的说法。那即是说，哲学家会勇敢地面对死亡，并拥有视之若无物的力量。这种哲学式死亡的原初范例是苏格拉底，我将在下文中详述。在《斐多篇》(Phaedo)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哲学家在面临死亡时应该高兴。实际上，他走得更远，竟然说：“真正的哲学家会为他们的职业而献身。”一旦人们学会了哲学式的死亡，就能够带着自制、平

静和勇气去面对我们会死的事实。

几个世纪之后，在斯多噶学派的塞内卡那里，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出现了更为激进的表达，他写道：“不懂好好死的人也不会好好活。”对他来说，哲学家会享受漫长的生命，因为他不会为其短暂而担忧。斯多噶学派试图教给我们的是“一些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和近乎神圣的东西”，即面对死亡时的平静。

塞内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然下列情况除外：公元 39 年，他被卡里古拉 (Caligula) 皇帝判处死刑；公元 41 年，又被克罗迪乌斯 (Clodius) 皇帝流放，罪名是与皇帝的侄女通奸；最后，公元 65 年，在成为罗马世界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和最有权势的官员的时候，他却由于尼禄皇帝的命令而不得不自杀了。他预言般地写道：

我深知造物主让我置身于怎样暴虐的一个群体中。常常有大厦倒塌声在我耳边响起。很多通过讲坛、元老院和日常谈话而与我有关的人都在一个夜晚被夺走了生命，一度握在一起的友谊之手被无情斩断。当过去总是出现在我周遭的罪恶有一天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应该感到吃惊吗？

尽管哲学家们的死亡并非总是像苏格拉底和塞内卡那般高贵，我仍然愿意为哲学式的死亡理想辩护。当然，在目前的世界中，这其实是一种很难为之辩护的理想，如今人们所相信的唯一形而上之物是金钱，同时医学与长寿仍作为一种毫无疑问的善而被赞美着。但是，我相信，哲学能够教给我们面对死亡的从容，却不

会带来任何把美满、幸福等概念看作是虚幻的想法。或许这听起来很古怪,但在这些表面看起来呈现病态的书页中,我始终关注的却是幸福的意义和可能性。

简单说来,这本书讲的是哲学家们是怎么死的,我们能从哲学中学到何种对待死亡和临终时刻的合适态度。作为对蒙田格言的响应,我的希望是“制作一个带有评论的死亡登记簿”。我的信心来自于:通过学习怎么死,我们也可能学会怎么活。

让我为《哲学家死亡录》内容的编排方式解释几句。本书主要内容是用一些简短的条目——有时非常短——来介绍各位哲学家,列出他们的死亡方式,并经常把他们的死亡方式与其主要思想联系起来。这些条目可能短到一两句话,但当写到极为重要的或者我比较重视的哲学家时,也可能长到一篇小论文。例如,读者会发现某些人物的篇幅较长,而且关于他们的讨论会反复出现,像苏格拉底、第欧根尼、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庄子、塞内卡、奥古斯丁、阿奎那、蒙田、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休谟、卢梭、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尼采等都是如此。对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艾耶尔、福柯、德里达等 20 世纪的思想家,我也花了不少笔墨。这些条目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从公元前 6 世纪的泰勒斯直到现在为止。它们分成若干章节,反映出哲学史的几个主要时代。不过,我的年代表不会那么精确,哲学家们也不会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尤其是在它适合于我表达其他意思的时候。

我并不打算去描述所有重要哲学家的死法。博学的读者们将会看到一些空白,无疑会否认我的很多选择。一些哲学家遭到忽视的原因,一是因为从他们的死亡中我看不到任何特别有趣的东西可以讲,例如弗雷格(Frege)、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或奥斯汀(J. L. Austin);二是因为距离他们的去世太近了,例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去世于2007年6月8日,那时我正在写本书的结尾。简单说,我的目光主要聚焦于能够吸引我的哲学家。尽管如此,已然为数不少,约190位。

除了尝试囊括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或次要人物之外,本书还包括多位很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的女性哲学家,读者们还会发现不多的几位圣徒、中国古代哲学家、中世纪伊斯兰与犹太哲学家,其中几位哲学家对死亡持有非常有趣的看法(有几位哲学家的死亡还很引人注目)。

这些条目既能从头至尾地读,也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我不反对把本书视为杂录而用,但我的希望是从头至尾读下去,那样一连串累积的主题就会浮现出来,落到一个具体的论题上,即哲学不仅教人们怎么死,也暗示了怎么活。

马蒂斯(Matisse)曾经被问到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他答道:“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确实相信。”那我们可以说,本书正是以大量作品为基础的成果。尽管我的研究涉及海量的文献材料,但我决定不用脚注,以防弄乱正文。读者必须给予我信任。如果读者想查找本书的材料或想从中找到更多资料供自己使

用,那么可参考附在最后的参考文献;而若想搜寻更多语境性内容以及哲学史或哲学家史标志性符号的人们,应该来看此“序言”的最后一页。

学习怎么死——苏格拉底

传统上认为,哲学肇始于苏格拉底的受审和死亡,他受到梅雷多(Meletus)安虞多(Anytus)与吕贡(Lycon)的诬告而被判处死刑。他同时受到了两项指控:腐蚀雅典青年,不敬城邦所敬之神。在柏拉图的记载中,还有第三项指控,即苏格拉底引介他自己的“新”神。无论后一项指控的真相是什么,苏格拉底总是宣称要追随他自己的“神灵”(daimon),西塞罗将其称为一种“神圣的东西”:某个人的神或者魂魄,我们可能将其看作良心。然而,苏格拉底的“神灵”不是某种“体内之声”,而是一种会使他突然停止讲话的外在的信号或命令。

苏格拉底之死有时也被视作一场极具政治意味的审判,一位无辜的异见者死在了暴虐的政府手里。然而,不要忘记,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当中有不少相当反动的人物。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底亚(Critias)是公元前404—前403年间反民主恐怖统治的“三十僭主”的领袖。根据色诺芬(Xenophon)的记载,人们可能还会记得,苏格拉底唯一一次建议学生参与政治,针对的对象就是卡尔米德(Charmides),此君亦在“三十僭主”之列,后来与克里底亚一道死在了战场上。最后,还有亚西比德(Alcibiades),一位英俊、迷人、放荡的贵族,在柏拉图的《宴饮》(Symposium)中狂饮烂醉,并且两次背叛雅典:一次叛逃到斯巴达,后又叛逃至波斯。苏格拉底很难说是支持民主政体的,尤其是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所刻

画的他的形象更是如此，他的教学活动也可能被认为是在保守贵族中培养对民主政体的敌意。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出多幕悲剧。实际上，黑格尔说过，苏格拉底审判是悲剧离开舞台、彻底走进政治生活的时刻，也是雅典自身堕落与崩溃的悲剧。

围绕苏格拉底受审及被处死的事件，柏拉图写了四篇对话（《欧忒弗罗》[*Euthyphro*]、《申辩辞》[*Apology*]、《克里同》[*Crito*]、《斐多》），另外我们还有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与《申辩辞》。在四篇对话中公认最末一篇的《斐多》中，苏格拉底的话语充满了柏拉图的毕达哥拉斯式的灵魂不朽信念。但更早时候的《申辩辞》却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苏格拉底说死亡也并不都是坏事；反之，它也是一件好事。这话的意思是说死亡具有两种可能性，二者必居其一：

它既是一种湮灭，死者不会再有任何意识；同时，正如我们听说的，它也是一次实在的改变；灵魂从此地迁徙到彼地。

可是，苏格拉底坚持认为，无论哪种可能是真，死亡都是不应该害怕的事。如果它是一种湮灭，那么它就是一次漫长的无梦之眠，还有什么事情比它更快乐呢？如果它是通向某地——所谓的冥府——的通道，那么它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我们将会遇见很多老朋友与希腊的英雄，还能与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一些不朽的人们交谈。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有个人告诉他：“三十僭主已经判你死刑了。”他回应道：“随他们吧。”同样地，苏格拉底将问题扔给了起诉者以及陪审团，声称他们应该自信地面对死亡。被判决死刑之后，苏格拉底用下面的惊人之语结束了发言：

现在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活着；
但将来我们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这句话浓缩了古典哲学对待死亡的态度：死，完全不值得恐惧；反之，死还是生之所依。苏格拉底谜一般的遗言——“克里同，我们应该向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献一只鸡”，表达了死是生之良药的观念。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药之神，遭受疾病之苦的人们在睡前向他敬献牺牲，希望能够唤醒病愈之人。所以，死亡，只是一场治疗性的沉睡。

谈到《申辩辞》中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态度，我们必须强调，尽管死亡有两种可能性，但我们不知哪一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哲学是学习怎么死的学问，但它研究的东西并不是“知识”(Knowledge)。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哲学教授的东西不是那种可以像商品一般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这种买卖正是诡辩士们(Sophists)——高尔吉亚(Gorgias)、普罗迪克斯(Prodicus)、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希庇阿(Hippias)等人——的生意，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无情地批判了他们的观点。尽管苏格拉底自己也被讽刺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其作品《云》(Clouds)中
讥 讽 为 “ 诡

辩士”，但“诡辩士”是一个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的职业教师阶层，

他们收取费用,指导青年人学习公共演说技巧。“诡辩士”精通雄辩术,用斐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的话说就是“舌头抹了蜜”,他们漫游于各个城市之间,用知识来换取钱财。

与富于魅力、衣装华丽、许诺知识的“诡辩士”相反,苏格拉底面容丑陋,行头寒酸,看起来只有一堆似是而非的悖论。一方面,德尔菲神谕宣称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总是坚称自己一无所知。然而,世界上最智慧的人怎么会一无所知呢?当我们学着区分智慧与知识,并成为热爱智慧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哲学家)的时候,这种表面上的悖论就消失了。

例如,在《理想国》中,研究的目标是正义。“正义是什么?”苏格拉底问,随后各种多少有些传统的正义观得到了讨论、分析和排除。但是,在《理想国》最核心的一卷中,苏格拉底并未向对话者提供关于正义问题的答案,或者提出关于正义的理论。他反而给我们讲了一串故事——最为有名的就是洞穴神话——向我们“间接地”说明了问题所在。他告诉我们,只有灵魂向善,才可以走上通往正义之路,准确来说,这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爱。在知识领域中怀疑确定性,并培养对智慧的热爱,哲学就开始了。哲学不仅关乎知识,也和爱欲有关。

现在就是强调哲学与诡辩之间区别的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周围存在着数不清的新诡辩。电视布道者们讲述着关于上帝真言的

权 威